

# 论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权力与权利基础

江 凌

**摘 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为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文化领导权”和网民的文化权利保障提供了思想源泉与理论基础。用“文化领导权”和“全景敞视主义”理论诠释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权力基础和公民隐私权、知情权、文化共享权、文化表达权等文化权利基础，力图更好地解决网络文化安全治理中的困惑，诠释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权力与民众文化权利基础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提供合法性依据，进而提出解决网络文化安全治理问题的一些对策。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全景敞视主义；网络文化安全；文化权力；文化权利

**作者简介：**江凌，男，副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200240）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5）01-0012-05

网络文化是社会舆论热点、焦点问题汇聚的场所，它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全景覆盖作用。目前，我国的网络文化存在着种种乱象和嘈杂的声音，比如，网络文化娱乐化、低俗化、媚俗化甚至色情化倾向加剧；一些境外势力企图渗透、冲淡中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建构所谓西方普世文化价值观……网络文化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解决我国当前网络文化安全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需要从文化经典理论中寻找网络文化权力和权利思想根源与理论根基，用“文化领导权”和“全景敞视主义”理论诠释网络文化安全治理和公民隐私权、知情权、文化共享权、文化表达权的合法性，诠释网络文化治理权力与民众文化权利的互动关系，可以更好地解决网络文化安全治理中出现的理论困惑。本文基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为我国网络文化安全的构建提供文化权力和文化权利的合法性治理基础，进而提出解决网络文化安全治理问题的一些对策。

## 一、“网络文化”、“文化安全”与“网络文化安全”

随着互联网、新媒体与移动终端技术的日新月异，以社交网络与新媒体为内容生成来源与信息传播渠道的网络文化正时时刻刻影响和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所谓网络文化，指“人们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手段、以数字形式为载体、以网络资源为依托，在从事网络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形式的文化。”<sup>[1]</sup>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与传统意义上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存在显著不同。首先，网络文化具有跨国界、无边际的开放性，世界各国文化的信息在网络彼此交汇碰撞；其次，网络文化具有高度无序化、难控制、“无政府”、“自由化”的特点，具有去中心化的特质，任何人都被赋予平等参与网络文化活动的权利；再次，网络文化具有极强的娱乐性与后现代特质，它排斥来自传统社会的观念法则，宣扬个性的解放与价值观的多元化。基于网络文化的以上特征，我们既不能否认网络文化对全球化和人类精神需求的贡献，也必须看到隐藏在网络文化背后的技术异化、知识碎片化、价值观多元化、去中心化甚至离散趋势，以及文化安全及主权等问题的严峻挑战。其中，尤其值得警惕的便是网络文化以文化全球化为名，对国家文化安全所造成的种种威胁。

关于“文化安全”，国际学术界通常用“文化多样性”、“文化例外”、“社会文化安全”、“非传统

安全”等概念来表达此类的问题。<sup>[2]</sup>于当下中国而言,“文化安全”主要指人们认为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会在全球化大趋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sup>[3]</sup>文化安全是一种特殊的安全,它具有间接性、隐蔽性和缓性和等特点。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认为,“文化存在遭遇生命的威胁和侵略,必然给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存在价值、存在意义和它的全部合法性带来深刻的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从而也就构成了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全部内容和意义。”<sup>[4]</sup>因此,强调“文化安全”的目的在于防止其他国家、民族文化,以及国内某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网络意见领袖”携网络草根文化对本国、本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行为方式和评判标准的异化和重新构建。

网络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一部分,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网络物质文化安全(主要包括像防火墙之类的各种网络安全硬件设备和软件产品)、网络制度文化安全(包括各种维护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和网络精神文化安全(包括人们对网络安全的意识、心理、理论、价值倾向)。<sup>[5]</sup>总体而言,网络文化安全目前突出存在以下问题:渗透性文化安全、变异性文化安全、侵害性文化安全、腐蚀性文化安全与破坏性文化安全,<sup>[6]</sup>分别对应了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非理性价值观蔓延、国外娱乐产品入侵、黄赌毒信息泛滥、黑客攻击与网络病毒猖獗等现象。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强势的网络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渗透性威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变异性威胁;利用网络文化娱乐产品(如游戏产品等)的输出对中华主流文化的侵害性威胁;以及网络色情、迷信等垃圾文化信息带来的腐蚀性威胁,网络病毒、网络犯罪等带来的破坏性威胁,等等。

## 二、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权力基础:“协商”、“收编”与领导权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所谓“文化领导权”,指的是某种进行中的状况,它描述了统治阶级通过操纵“道德及精神领导权”的方式对社会加以引导而非统治的过程,霸权从来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而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互相“协商”的结果,是一个同时包含着“抵抗”和“收编”的过程。<sup>[7]</sup>葛兰西还认为,这种霸权受到为各个阶级代言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操纵。

按照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观点,网络文化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积极地消费社交网络和新媒体的文本与实践之中产生的。人们通过参与到网络文化的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创造出网络文化自身带有的草根性、自由性、多元性、煽动性和易变性的特征,也使之成为与我国当前官方意识形态有一定区隔的新文化。不过,通过网络上林林总总的文化元素碰撞与观点、意见的交锋,网络文化的独立倾向将不可避免地被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因素所浸润,从而逐渐褪去信息良莠不齐、观点过于偏激、形式难以固定等特点。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出发,可以建构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权力基础,即通过媒体、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普通网民之间不断地互动与“协商”,从而实现政府与各阶层民众对网络文化领导权的共享与共治。作为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权力基础,文化领导权主要解决的是网络文化的舆论究竟由谁主导、如何主导的问题,关系到网络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确立与维系。

当前,网络文化尤其是网络舆情文化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各色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或“公共意见领袖”言论泛滥,极端、片面、非理性甚至煽动性的网络舆论观点层出不穷并且还拥有大量拥趸。反之,真正体现理性价值、主流价值的声音却被淹没。而与此同时,一些政府主管部门对待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尤其是一些社会负面事件的反应过慢、处理态度不好、处理方式不对,甚至有欺骗和蒙蔽网民之嫌,往往导致网络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到了政府价值立场、观点的对立面,也使不少网民因此对现行网络文化治理体制、机制产生抵触情绪。而在网络舆情出现如此危机的背后,不仅可以看到网络文化背后所隐藏的社会阶层对立,也可以发觉国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通过少数“公共知识分子”或“公共意见领袖”作为发声器,在中国互联网上散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迹象。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往往无法对此区分,引发网络文化安全在舆情方面出现了种种矛盾冲突不断的对立性事件。

说到底,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在于当前网络文化监督治理部门对网络文化的生成机制还缺乏深刻认识。根据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如今网络上大多数来自“公共知识分子”或“公共意见领袖”的言论,很大程度上都代表了民间草根阶层对积极参与网络舆论的生成与传播,以及争夺和捍卫自身阶层话语权的渴望,充分体现了网络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抵抗”性特征,其抵抗对象主要是官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或“公共意见领袖”言论的出现,一方面迎合了民众的这种“抵抗性”或“排斥性”需求,另一方面也利用这种需求以影响或操纵网络舆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政府主管部门在应对网络舆论热点事件时,却没有把握好自己在社交网络与新媒体平台上的“文化领导权”地位,非但没有利用好自身具有的主流价值文化与舆论优势,而且还没有充分与来自草根、来自“公共知识分子”、来自“公共意见领袖”的网络舆情形成良性互动,没有进行有效的“收编”,导致有限的应对措施和行为前后不一致甚至混乱,难以真正达到取信于网民、说服民众的效果,客观上为非理性网络文化的蔓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网络文化主管部门而言,网络舆情的领导权自然是必须要维护的对象。但如何维护网络舆情的领导权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根据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网络文化的生成是一个存在上下阶层间互动和“协商”的过程,不仅有来自民间或草根网络舆论对统治意识形态的“抵抗”,也有来自官方网络舆论对民间草根网络文化的改造与“收编”。要完成这种“抵抗”与“收编”,政府在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方面首先就必须放下身段,以“协商”者的姿态出现,积极掌控网络舆情的领导权,官方网络舆论应当发挥自身权威性强、可信度高的特点,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社会民众关注的敏感与热点问题,研究分析其发生和发展的机制与环境,选好时机及时正面解释、引导,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积极主动地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要向民间网络文化学习网络发声的内容与形式特征,力求更贴近民众的接受习惯、接收方式,以吸引和培育一大批对网络理性声音和“正能量”有憧憬的网民,通过他们的人际传播、网络传播扩大官方网络舆论的传播范围与影响,让偏离理性价值和明显具有煽动性的网络舆论被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所淹没,乃至遁于无形。除此之外,还不能忽略网络文化主管部门的“防火墙”作用,要坚决捍卫国家文化主权,防止国外意识形态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对网络文化的渗透,“必须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社会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系统、理想信念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各种力量的侵蚀。”<sup>[8]</sup>

### 三、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权利基础:“全景监控”与隐私权

“全景敞视监控”是18世纪英国知名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设计的一种监控类型,他坚信这种监控类型是获取控制人们精神权利的全新方式。而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福柯则藉此提出全景敞视主义,他认为全景敞视监控的主要作用在于使置身其内的人自己意识到监控的无处不在,从而主动规范自己的行为,确保权力机制的自动运行,在这其中,每个人都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控制者,又是被控制的对象。<sup>[9]</sup>

如福柯所言,全景敞视主义规范的目标是人们行为乃至思想的“标准化”,监视是权利机制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如今,我们生活在到处都是监控探头的世界中,而网络文化也几乎处于网络监控的全景覆盖中,仅从美国的“斯诺登事件”就可见一斑。一方面,合理、合法、适度的监控可以规避不少来自未经加工的网络文化的内容性风险;另一方面,由非法监控带来的网络攻击与网络骚扰却让我们不胜其扰。人们一方面为自己受到无所不在的监控而感到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却同时又在为打探公众



人物或别人的隐私而乐此不疲。从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出发，则可以建构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权利基础，即通过加大政府网络监控的力度和范围，逐步消除网络安全隐患与网络文化乱象，保障每一个网民都在政府保护下享有网络隐私权、知情权、共享权、表达权安全。作为网络文化的权利基础，公民的隐私权等权利是政府采取合法监控手段所希望保障的对象，也是网络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权利保障。

网络监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通过合法手段对网络文化的信息数据传输安全与内容正当性进行必要、适度的监控，另一类则是不法人士通过网络监控技术手段以黑客攻击、病毒植入等方式非法窃取用户个人隐私与商业机密，或是通过社交网络与新媒体肆意传播反动、色情、暴力、赌博等不良文化信息。也就是说，网络世界的监控是一柄双刃剑，如果被正确地用好了可以维护广大网络用户的隐私安全、文化权利安全，反之被错误地用在窥探隐私、乱扣帽子甚至罗织罪名、打击异己等邪门歪道上，则是对网络文化安全的严重破坏。因此，对于政府网络主管部门来说，将网络文化监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显得极为重要。

在当下的全景监视机制下，我们每个人都时刻处于监控和被监控的环境中，我们既承担监视者的角色，又是被监视的对象，网络世界正是因为监视行为而被“标准化”。这既体现了当代网络文化与监视行为的密不可分给人们造成的无奈，也为国家政府主管部门对网络文化的正当监视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既然全景监视机制是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那么如何利用好全景监视机制保障网民的隐私权、知情权、文化共享权、表达权等文化权利，以及如何利用网络监控权消弭来自网络的非法监控与不良信息扩散，成为摆在政府主管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

对于政府主管部门而言，对互联网的监控权应当以维护网民的隐私安全与文化健康为宗旨。首先，作为维护网络文化安全的行政主体，政府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合理配置资源和明确权责界限等途径，积极推动网络文化治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不断赋予网络文化管理新的内涵。”<sup>[10]</sup> 总体而言，就是要建立和健全网络信息传播的监测和预警机制，通过创新管理方式和提高管理效率的方式进一步规范网络文化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其次，要在技术上加大对黑客攻击与病毒传播的控制力度，“鼓励网络技术人员开发和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信息的实际控制能力，并使技术手段成为实施自律和他律的有力保障”；<sup>[11]</sup> 第三，对于各种涉及色情、暴力、赌博等不良信息的互联网文化，要加大监控和疏堵结合的力度，一方面要严格监控和加大查处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持续做好宣传和教育引导的工作，推动相关从业人员的自查与自律；第四，要对各种来自境外的具有渗透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引起重视，在加大监控力度的同时，予以坚决抵制，以强大的中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予以稀释、消解；最后，社会各方面力量要有所作为，同政府主管部门形成合力，在网络文化的舆论阵地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正能量”，以消除部分消极、负面等不良文化信息的传播力、影响力，让网络文化真正发挥其改善人类精神生活品质、促进全球民众良性交往沟通、推动政府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 四、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权力基础与权利基础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权力与文化权利之间存在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行使文化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充分伸展与实现，民众文化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也能够为文化权力合法、合理、有序运行提供法理依据和社会支持。网络文化安全的权力基础与权利基础同样存在类似的互动关系。政府官方网络文化通过与民间网络文化的“治理”、“协商”与“收编”，确立和巩固网络文化治理的领导权，同时，这种“文化领导权”也是为了治理和消弭当前民间网络文化所存在的种种不健康或偏颇问题，以维持网络舆论的正常生态和发展环境，保障中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保障了民众的互联网文化权利的合理、合法、健康、有序行使,保护了民众在网络文化中的隐私安全和其他文化权利安全,从而为网民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文化权利(如知情权、共享权、表达权、传播权等),为网络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政府主管部门对民众的网络文化权利安全予以正当的监控和保护,也对政府官方舆论在网络文化方面的领导权以及网络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网络文化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与传统文化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文化能拥有任何特权,互联网空间并不是无政府主义之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府管理部门对该民族、该国家的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负有责任,民族、国家对网络文化的领导权,即网络文化安全的权力基础体现于官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网络文化的领导权,而政府所要保护的民众网络文化权利,即网络文化安全的权利基础则是政府的网络文化治理义务和公民的权利自觉。二者作为网络文化安全的两大基本基础,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府,已经建构了相对完备的网络文化监管体系,他们主要通过立法、行政监控、技术控制、行业自律、公众监督等措施维护和行使“文化领导权”,保障民众的文化权利需求,维护其网络文化安全。我国的网络监控与管理部门应该有所作为,既不能放松自己应有的文化领导权,也不能轻视网络民众所应享有的文化权利。政府管理部门应当重视通过“互动”与“协商”的积极态度,通过立法、行政监控、技术控制、行业自律、公众监督等措施,以积极稳妥的方式推动官方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对民间网络文化的“收编”,并通过合理、合法的监控手段维护广大网民切身的隐私权安全与其他网络文化权利,寻找相应的治理网络文化安全的具体解决之策,为未来网络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让我们网络文化的明天更加美好!

#### 参考文献:

- [1] 姚伟钧,彭桂芳.构建网络文化安全的理论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72.
- [2] 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31-35.
- [3] 潘一禾.文化安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28.
- [4] 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
- [5] 王燕,杨文阳,张屹.中国网络文化安全发展现状及相关政策研究[J].情报杂志,2008(4):145.
- [6] 徐龙福,邓永发.社会信息化发展的网络文化安全[J].江汉论坛,2010(11):18-19.
- [7]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8-99.
- [8] 于东江,王建.网络文化背景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安全建设[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69.
- [9]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60.
- [10] 徐龙福,邓永发.社会信息化发展的网络文化安全[J].江汉论坛,2010(11):20.
- [11] 刘桂珍.网络传播与文化安全[J].高校理论战线,2008(10):44.